

“扩大中的鸿沟”： 中国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状况与群体差异比较

刘保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家庭是教育再生产的“轴心”,教育投资是家庭为子女竞争稀缺教育资源的重要方式。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的数据,对中国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状况和群体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子女教育总支出随教育阶段差异呈现“V”形结构,即学前教育和初中教育高于小学教育;(2)校外“影子”教育支出从学前到小学再到初中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递增趋势;(3)与中低收入家庭和农村户籍家庭相比,较高收入家庭和城市户籍的家庭在子女总教育支出以及“影子”教育支出上不仅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而且在子女教育投资意愿上也更高。认为在市场化转型时期,子女教育支出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与“增长的分化”加剧了弱势群体家庭的教育累积劣势,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教育“鸿沟”不断扩大。

关键词: 教育投资;教育支出;影子教育;群体差异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20)02-0016-09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中国家庭一向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并把“教育自救”视为在社会阶梯上攀爬的路径。近些年,在市场化转型时期,我国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回报率提升,使得家庭愈加重视在子女教育上的投资;同时,伴随着教育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家庭教育的支出也迅猛增长。2011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开展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子女教育支出已成为家庭经济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支出比例较大^[1]。随着我国免费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中小学阶段的学校教育收费逐渐标准化并趋于降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家庭的教育负担在降低。目前,我国教育已经同医疗、住房并列成为三大民生问题,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随着教育资源的经济竞争愈演愈烈,家庭教育费用逐渐由校内转嫁到校外,“学校之外”正成为教育竞逐的主要场域。近些年,家庭除了支付子女正常的上学费用之外,还要负担择校费、购买学区房、参加各种名目的课外辅导班、补习班、兴趣班等费用,造成“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同时,不同群体的

家庭在子女教育投资上出现严重的分化和不平等^[2],致使“起跑线”话题屡屡见诸报端。本文使用“家庭教育支出”测量家庭的教育投资状况,并使用全国代表性数据,重点分析三个问题:一是当前中国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总体状况和主要特征;二是在市场化转型时期家庭教育支出普遍增加的情况下,不同群体的子女教育支出水平是否存在结构性的不平等;三是不同群体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投资意愿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一、家庭教育投资的涵义与构成

关于家庭教育投资(family educational investment)的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框架内,家庭教育投资通常被理解为家庭花在子女身上的教育费用^[3]。该理论认为,作为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形式,家庭花在子女身上的教育费用不只是满足暂时的需要,而是使子女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技能和健康等人力资本,从而可以提高家庭未来的收益,同时也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广义上理解,家庭教育投资是一个包含了多重面向的

收稿日期: 2019-1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SH045)

作者简介: 刘保中(1983—),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概念,既包括了教育支出、物质投入等货币性资源,也包括了教育观念、抚养时间与精力的付出等非货币性资源^[4]。本文选择狭义的界定,即把家庭教育投资理解为家庭教育支出(family education expenditure/spending),指购买教育的全部支出的货币表现,代表着家庭对子女教育的经济投入情况,不包括时间和精力成本等。

家庭教育支出由多项内容组成,关于家庭教育支出的结构,以往研究比较典型的有三种划分。第一种,是将家庭教育支出的费用区分为直接教育费用和间接教育费用。如提拉克(Tilak,2002)的研究认为,直接的教育费用是指家庭付给学校的学费和考试费、注册费、选课费等其他费用,间接的教育费用是指购买教材、文具、服装、交通、家教等费用^[5]。第二种,是将家庭教育支出区分为校内支出和校外支出。如楚红丽(2008)认为,校内支出是家庭因教育而交给学校的全部费用,如学杂费、住校食宿费等;校外支出则是因教育而发生的交给学校以外的全部费用,如校外辅导训练费等^[6]。学界进行类似划分的还有丁小浩、翁秋怡(2015)。他们把子女教育支出区分为学校教育支出和校外教育支出,前者包括学杂费、书本费、伙食费、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后者包括择校费和兴趣班、家教等校外补习的费用^[7]。第三种,是把家庭教育支出划分为基本性教育支出、扩展性教育支出和选择性教育支出三种,代表性研究有涂瑞珍、林荣日(2009)^[8]。他们认为,子女基本教育支出包括了学费、住宿费、伙食费、交通费、校服费;扩展性教育支出包括了补课费、兴趣班费、家教费、课外读物费、学习用品及电子产品、暑假辅导班费;学界选择性教育支出为择校费和赞助费。

学界关于家庭教育支出的划分虽然彼此存在差异,但从这些研究基本可以总结出,学校教育支出和校外教育支出构成了家庭教育支出的两个主要方面。本文将在变量定义部分进一步详细介绍对家庭教育支出内容的界定。

二、教育竞争场域的变化与家庭教育投资的群体分化

(一)家庭成为教育再生产的轴心

在现代社会,教育再生产并不是以直接再生产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通过家庭或者学校进行再生产。虽然学校教育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再生产角色,但与此相比,家庭仍旧是社会资源

的主要分配单位;学校是显性的精英选拔机构,家庭则内隐地进行筛选;社会筛选的过程始于家庭,而家庭又被纳入到社会阶层结构之中。因此,家庭的阶层地位构成了教育资源分配和教育选拔的基础。在市场转型时期,教育机会的家庭资源转化模式成为解释当前教育不平等的重要机制^[9]。根据这一解释机制,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家庭凭借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经济、文化、社会资本在教育场域中竞争资源与机会;而子女的教育竞争优势则取决于每个家庭在资本谱系中的位置,以及对不同形式资本的占有规模和兑现能力。由此可知,经济资本是家庭资本中重要的资本形式,并且教育投资作为家庭经济资本的资源转化形式,具有经济资本优势的家庭更容易将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转化为经济投入和物质保障。

此外,在中国公共教育投资长期严重不足的前提下,个体家庭的教育投资能力对于子女获得稀缺教育资源来说显得尤其重要。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也获得长足发展,各级教育规模逐渐扩大,教育资源不断优化,教育经费也在大幅提高,由政府公共投资和家庭私人投资构成的教育投资结构也在发生显著变化。1993年,国家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要在20世纪末达到4%,即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但是,我国这一目标直到2012年才得以实现。

(二)教育竞争场域的变化

教育是当前中国父母焦虑集中的领域,如何让孩子在考试竞争中优胜并最终考入精英大学成为多数父母理想的成功路径。本文关于家庭教育投资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学校教育支出和校外教育支出构成了家庭教育支出的两个主要方面。尽管关于家庭教育支出的统计口径和样本代表性上存在差异,但是很多研究已经开始注意到家庭教育支出在结构上的变化。钱晓焱等人(2015)^[10]利用国家统计局“教育支出专题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家庭校外支出在大幅度增加,相比于2007年,2011年家庭校外教育在2011年的支出增长接近2.5倍,校内教育支出下降幅度则超过40%。薛海平(2015)的研究认为,家庭围绕课外补习、特长班、兴趣班等“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展开的日益激烈的博弈竞争,使得学生的学业竞争从校内扩展到校外,学校教育再生产的功能逐渐让渡给“影子”教育。2017年,我国《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

告(2017)》的数据显示,全国中小学阶段学生整体的校外培训总体参与率为48.3%,而且城市地区的这一比例明显更高;学生在培训内容上,以学科补习和应试为主。

国家的“减负”政策刺激了家庭寻求“影子”教育的需求。家长普遍认为,在选拔性升学考试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如果学生只是接受学校减负后的教学内容,很难应付越来越激烈的升学考试。因此,一方面,国家“减负”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反而刺激了课外补习需求;另一方面,以致学校减负越多,留给课外培训市场的空间就越大。实际上,国家在多次下达学校“减负令”的情况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而弱化了学校作为教育供给的主体性地位,导致家长们愿意付出更高的市场价格为子女挑选、购买更好的教育产品和教育资源,为孩子创造更加丰富和个性化的教育选择,帮助子女获得考试竞争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优势。

教育市场化无疑进一步刺激并加剧了校外教育竞争。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市场机制越来越多地渗入到教育领域。近些年,社会上普遍热议的幼儿园高收费和“天价幼儿园”,即是学前教育严重市场化的反映。我国即使在义务教育阶段,受市场化的影响也非常明显。虽然学校免除了学费和学杂费,但是家庭教育成本却并未降低,而是转嫁到校外,比如择校费、购买学区房、课外辅导费等。2017年,一篇《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的帖子在微信朋友圈里迅速热传。虽然有很多家庭不会达到区区一个假期就为孩子投入3万元的程度,但是教育“烧钱”现象无疑引起了众多家长的共鸣。由于教育市场化愈演愈烈,使得教育机会的家庭资源转化机制得到进一步强化,家庭经济资本比以往更容易而且更有效地转化为子女差别化的教育机会。

(三) 家庭教育投资的群体分化

随着教育竞争场域的重点逐渐由校内转移到校外,由学校转向市场,不同群体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权重在增加,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家庭教育投资的不平等。国内已有不少研究对阶层、城乡等不同群体的家庭教育投资差异进行了关注。丁小浩、翁秋怡(2015)的研究指出了父母职业、受教育水平等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教育支出产生显著影响^[7]。涂瑞珍和林荣日(2009)以上海地区有子女就读的居民家庭为调查对象,对城乡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城

乡家庭教育支出差异显著,与农村家庭为子女在小学、初中和高中各个阶段支出的教育费用相比较,中心城区家庭在这三个教育阶段的支出分别是农村家庭的1.95倍、1.34倍和1.52倍^[8]。曾满超等人基于对三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省份的初中学生课外补习调查的分析显示,城市学生课外补习支出的水平远高于农村学生^[11]。笔者认为,这些研究尚存在一些局限。首先,这些相关研究大部分使用的还只是个别城市、少数省份或者城镇地区的数据,并非基于全国的样本,不具有完全代表性。其次,尽管这些研究回答了不同群体在子女教育投资上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和不平等,但是是否还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分化或者不平等,并没有给予解答。

本文试图使用有代表性的全国样本,在分析不同群体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支出上是否存在结构性不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分析不同群体子女教育支出投资意愿的差异,以期回答教育投资的群体差异有可能会得到缩小还是扩大。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是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层次、长期性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该调查样本覆盖了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青海省、海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等,未含港澳台地区)的家庭;样本覆盖地区的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未含港澳台地区)的95%;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在抽样方法上,考虑到中国地区间的地理差异性,CFPS抽样设计通过内隐分层(implicit stratification),采用了多阶段、多层次、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式(PPS)。

CFPS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长期关注少儿教育、成长与发展的情况,并针对16岁以下少儿群体建立了专门的儿童数据库,收集了少儿成长过程中各个方面的信息,同时又有翔实的家庭背景信息可供综合分析^[12]。由于CFPS儿童库中就读高中阶段的学生数量非常少,同时考虑到在学前教育之前子女的教育费用总体上较低,本文只选取CFPS儿童库中接受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的儿童样本作为分析对象,去除教育支出的缺失值后的样本量为5337个。本文在描述性统计部分针对这些样本进行了分析。在多元回归分析

部分,本文采用简单删除的方式进一步去除了其他影响变量的缺失值,最终进入分析模型的样本量为5 019个^①。

(二) 变量操作化

根据以往的研究,结合CFPS问卷题项的设置,本文将家庭教育支出区分为学校教育支出、“影子”教育支出、其他教育支出和子女教育总支出。表1

列出了这四类家庭教育支出的具体测量内容。

本文选取的影响变量主要包括家庭年收入、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子女的年龄、性别、城乡、兄弟姐妹数、受教育阶段等。本文根据子女的户籍性质来区分城乡家庭,城市家庭为非农业户口,农村家庭为农业户口。本文使用的主要变量及分布情况详见表2。

表1 四类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支出测量(12个月)

变量	测量内容
学校教育支出	①学杂费:包括保教费、托费、教育费等;②因学习产生的交通费;③伙食费;④住宿费;⑤过去12个月择校/赞助费
“影子”教育支出	课外辅导、家教、参加兴趣班、特长班等费用
其他教育支出	①书本费:不含学校发放的教材费、参考书费、课外书费等;②教育软件费用:指为了教育目的而购买的计算机软件费;③其他费用
子女教育总支出	学校教育支出+影子教育支出+其他教育支出

注:本文关于“其他教育支出”的统计划分与原问卷不同,“其他教育支出”除了原问卷中包含的其他费用之外,还纳入了书本费和教育软件费用

表2 家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百分比
家庭全年教育总支出(元)	5 337	3 340.6(5 053.3)
家庭全年学校教育支出(元)	5 337	2 380.6(3 571.4)
家庭全年影子教育支出(元)	5 337	622.3(2 670.8)
家庭年收入(元)	5 041	55 619.6(89 976.6)
父母较高受教育年限(年)	5 321	8.6(4.0)
家庭户籍(%)		
城市户籍家庭	1 068	20.0
农村户籍家庭	4 263	80.0
性别(%)		
男孩	2 804	52.5
女孩	2 533	47.5
子女兄弟姐妹数(个)	5 337	0.9(0.9)
子女受教育阶段(%)		
学前(幼儿园)	1 477	27.7
小学	2 818	52.8
初中	1 042	19.5

注:括号内为连续性变量的标准差

① 为了评估缺失数据对模型稳健性的影响,本文还采用了多重插补法(multiple imputation),针对样本中缺失数据最严重的家庭收入变量(296个样本缺失)进行了数据填补调整,对比插补数据前后的分析结果发现,研究结论一致,表明数据缺失对结果影响不大。

(三) 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其中,描述性统计部分主要分析子女教育支出的总体特征和结构情况,并对不同收入阶层家庭、城乡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状况进行了比较。

在多元回归分析部分,本文首先分析不同收入群体家庭、城乡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其次通过进一步比较不同群体子女教育支出“收入弹性”(income elasticity)的大小,来分析这些家庭的子女投资意愿。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以子女教育总支出和的子女“影子”教育支出的自然对数作为因变量,以家庭收入的自然对数作为自变量,构造双对数基准模型,回归方程中家庭收入对数的影响即为两种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系数”。

本文在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模型分析中,针对家庭全年教育总支出,使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针对家庭全年“影子”教育支出,由于有相当的“影子”教育支出取值为0,两个变量的概率分布均是由一个离散点与一个连续分布所组成的混合分布,此时如果使用OLS来估计,无论使用整个样本,还是去掉离散点后的子样本,都会导致不一致的估计,对此,则采用了Tobit回归进行估计。

此外,为了排除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等方面的影响,本文所有模型均控制了区县固定效应。

四、描述性分析

(一) 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水平和结构

本文从学前教育、小学和初中三个学段来分析,认为我国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水平总体上呈现“V”形结构,即学前教育和初中阶段的教育支出相对较高,而小学阶段相对较低。在学前教育阶段,每个子女的家庭年均教育支出约为4 055.9元,在小学和初中阶段,每个子女的家庭年均教育支出约为2 514.2元和4 561.2元(详见图1)。

学校课外辅导班、兴趣班、特长班等影子教育支出则呈现从学前教育到初中逐级递增的趋势。学前教育阶段总体约为228.5元;到小学阶段增长到663.3元,大约是学前阶段的3倍;初中阶段,此费用总体已经上涨到1 065.7元,接近学前教育阶段的5倍。在不同的受教育阶段,家庭子女教育支出还存在结构上的差异。其中,学前教育阶段,学校教育支出构成了绝大部分的子女教育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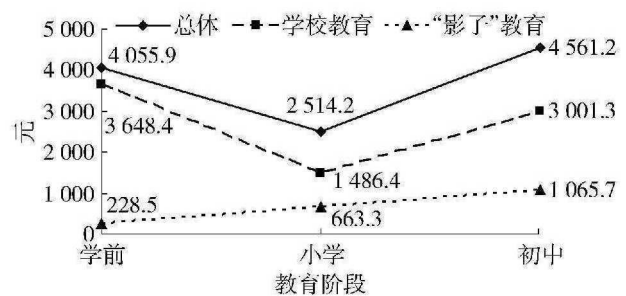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学段子女教育支出分布(N=5 337)

课外辅导费用仅约占5.6%。相比之下,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子女校外教育支出占总教育支出的比重明显增大,分别为26.4%和23.4%。换句话说,学前阶段家庭的教育支出压力主要来自入学(园)费用,学龄后阶段家庭则开始越来越多地承受来自“影子”教育的压力。这种教育支出结构的变化主要是由我国当前的教育制度决定的。目前,我国义务教育只涵盖小学和初中阶段,学前教育尚未纳入义务教育范围,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基本是免试就近入学。到了小学和初中阶段,家庭越来越多地面临“小升初”和“初升高”的升学压力,家庭也越来越重视学科补习。

(二) 不同群体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状况的比较

本文尝试从两个方面:即不同收入阶层家庭和城乡不同户籍家庭比较不同社会群体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投资上的差异。本文将家庭收入从低到高按每20%进行五等分组,图2展示了教育支出在家庭收入分位数上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收入组的递增,在学前、小学和初中三个阶段,子女教育支出总体上也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家庭收入越高,子女教育支出就越高。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家庭收入分位数上的子女教育支出的增长幅度存在差异性,相比于较低收入组,较高收入组的增幅更明显。第1收入分位数和第2收入分位数的家庭教育支出相差不大,但是第4分位数到第5分位数的上升幅度明显在增加。以初中阶段为例,中等偏下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等偏上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家庭子女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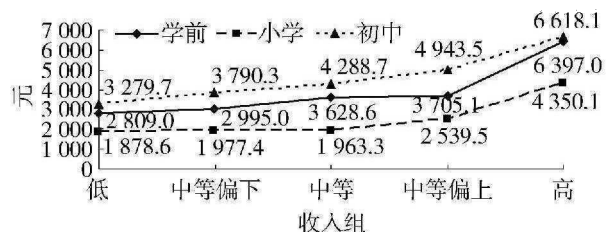


图2 家庭收入五等分各組子女总教育支出的分布

育支出分别是是低收入组的1.2倍、1.3倍、1.5倍和2.0倍,中等偏上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在教育支出上的增加幅度相对更大。

在家庭“影子”教育支出上,家庭也存在相似的情况。随着收入的增加,高收入家庭的“影子”教育支出增长幅度较大,而中低收入家庭的增幅较小。以小学阶段为例,前三个收入分位数上的家庭“影子”教育支出差异不大,分别为243.8元、319.1元和476.7元,但是到第4分位数上升的速度明显增加,中等偏上收入组接近是中等收入组的1.5倍,高收入组的上升速度最快,是中等偏上收入组的2倍多。无论是家庭教育总支出还是“影子”教育支出,高收入阶层家庭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较低收入阶层的增长速度,这种“增长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贫富阶层在家庭教育投资上的分化(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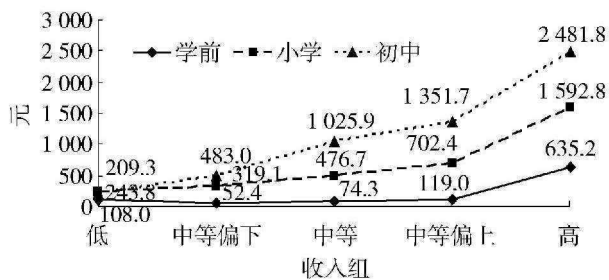


图3 家庭收入五等分各组子女“影子”教育支出的分布

表3对比了城乡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支出情况。从家庭全年总教育支出来看,整体上城市家庭明显高于农村家庭,其中城市家庭对单个子女的年均教育支出为6339.7元,农村家庭仅为2586.2元,城市家庭是农村家庭的2.5倍。我们从学前、小学和初中三个学段来看,城市家庭年教育支出总额分别是农村的2.9、2.6和1.7倍。子女所处的教育阶段越早,城乡家庭经济投入的差距越大。就全年“影子”

表3 城乡家庭全年教育总支出与课外补习支出

家庭教育支出	阶段	城市/元	农村/元	城乡比/%
全年家庭教育总支出	学前	8727.1	3031.5	2.9
	小学	5009.8	1909.4	2.6
	初中	6717.9	3855.1	1.7
	总体	6339.7	2586.2	2.5
全年影子教育支出	学前	997.8	60.7	16.4
	小学	2441.8	234.8	10.4
	初中	3024.6	424.4	7.1
	总体	2225.1	220.3	10.1

教育支出而言,城乡差距更为明显,城市家庭总体为2225.1元,大约是农村家庭的10倍。同样是子女所处的教育阶段越早,城乡家庭经济投入的相对差距就越大。在学前教育时期,城市家庭花在孩子课外辅导班、兴趣班等方面的费用是农村家庭的16倍多。此外,从校外补习、兴趣班支出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比重上看,城市家庭总体为35.1%,明显高于农村家庭的8.5%。

我国实行义务教育免收学费和学杂费,学校收费的项目和依据也趋向于标准化和公开透明,城乡家庭在学校教育支出方面的差距在缩小。但是在学前教育尤其是“影子”教育支出上的差距十分明显,城市家庭把对子女三成多的教育花费用在了“影子”教育上,而农村家庭在这方面的花费还不到总教育支出的十分之一。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农村家庭收入水平普遍偏低,无法在课外辅导班等“影子”教育上进行更多的经济投入;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农村教育资源匮乏、课外辅导市场发展相对缓慢造成的^[13]。

五、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本文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进一步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及在不同群体中的差异进行分析。收入弹性(income elasticity)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是衡量消费者收入变动时需求量变化的程度大小,它反映出消费需求对收入变动的灵敏度^[14]。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教育投资的增加幅度即“弹性”也是存在差异的。收入弹性的系数如果大于1,表明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教育支出也随之增加,并且增加的幅度大于家庭收入增加的幅度。收入弹性的系数如果大于0小于1,表明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教育支出也随之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小于于家庭收入增加的幅度。本文试图通过对家庭教育支出收入弹性的分析,了解不同群体教育投资意愿的差异。

本文分别呈现了不同群体家庭子女教育总支出和“影子教育”支出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详见表4~5)。需要说明的是,表4和表5的多元回归分析对收入群体的划分并未采用描述性分析部分将家庭收入五等分的方式,而是将采用二分法,即将前3个收入分位合并为“中低收入组”,后2个分位合并为“中等以上收入组”。本文采用此处理方式,一是为了简化分析,二是基于描述性分析结果;相比于后2个分位,前3个收入分位教育支出的增加幅度相对

表4 不同群体家庭子女教育总支出的OLS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1 全部样本	模型2 中等以上收入组	模型3 中低收入组	模型4 城市组	模型5 农村组
家庭年收入对数	0.113*** (0.020)	0.333*** (0.072)	0.064* (0.028)	0.224*** (0.053)	0.096*** (0.022)
城市家庭(农村家庭=0)	0.242*** (0.067)	0.278** (0.088)	0.148 (0.10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县固定效应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R ²	0.241	0.280	0.206	0.246	0.626
样本量	5 019	2 006	3 013	1 015	4 004

注:1.限于篇幅,模型未显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2.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3.***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表5 不同群体家庭子女“影子”教育支出的Tobit回归分析结果(边际效应)

变量	模型6 全部样本	模型7 中等以上收入组	模型8 中低收入组	模型9 城市组	模型10 农村组
家庭年收入对数	0.783*** (0.155)	2.277*** (0.450)	0.057 (0.227)	0.993*** (0.265)	0.698*** (0.206)
城市家庭(农村家庭=0)	4.376*** (0.423)	3.804*** (0.565)	5.121*** (0.63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县固定效应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Pseudo R ²	0.112	0.112	0.109	0.066	0.081
样本量	5 019	2 006	3 013	1 015	4 004

注:1.限于篇幅,模型没有列出回归系数值,而是仅列出了回归系数的边际效应值,同样也未显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2.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3.***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较小,采用合并处理的方式更容易检验不同群体在教育支出上增长的差异。

表4模型1是对全部样本的检验结果,分析显示家庭收入对子女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113($p < 0.001$);表明家庭收入越多,子女教育支出就越可能增加。其中城市家庭的影响系数为0.242($p < 0.001$),表明城市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显著高于农村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模型2和模型3分别针对不同收入群体子女教育总支出的分析显示,中等以上收入组的收入弹性系数为0.333($p < 0.001$),中低收入组的收入弹性系数为0.064($p < 0.05$),中等以上收入组的收入弹性系数明显高于中低收入组;表明增加同样幅度的家庭收入,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家庭增加投入家庭教育支出的幅度相对更大。模型4和模型5分别针对城乡家庭子女

教育总支出的分析显示,城市样本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系数为0.224($\text{sig} < 0.001$),农村样本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系数为0.096($\text{sig} < 0.001$),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系数小于城市家庭;表明增加同样幅度的家庭收入,城市家庭增加投入家庭教育支出的幅度更大。

表5呈现了不同群体家庭子女“影子”教育支出的Tobit回归分析结果。模型6是对全部样本的检验结果,分析显示家庭收入对子女“影子”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783($p < 0.001$);表明家庭收入越多,家庭对子女在课外辅导班、兴趣班等方面的支出就越可能增加。城市家庭的影响系数为4.376($p < 0.001$),表明城市家庭在“影子”教育支出上非常显著地多于农村家庭。模型7和模型8分别针对不同收入群体子女“影子”教育支出的分析显示,中等以上收入组的收入

弹性系数为 2.277 ($p < 0.001$), 远远高于中低收入组的收入弹性系数 0.057; 表明增加同样幅度的家庭收入, 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家庭增加投入“影子”教育支出的幅度相对更大。模型 9 和模型 10 分别针对城乡家庭子女“影子”教育支出的分析显示, 城市样本家庭的收入弹性系数为 0.993 ($\text{sig} < 0.001$), 农村样本家庭的收入弹性系数为 0.698 ($\text{sig} < 0.001$)。农村家庭“影子”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系数显著小于城市家庭, 表明增加同样幅度的家庭收入, 城市家庭增加投入“影子”教育支出的幅度更大。

六、结论与讨论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而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家庭增加子女教育支出、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经济能力, 但是以家庭为轴心的教育资源分配模式造成在资本谱系上处于不同位置的家庭, 在子女教育投资上形成结构性的不平等。这一状况在中国公共教育投资不足、教育市场化进程加速、家庭收入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得到进一步强化。近些年, 随着我国“影子教育”大行其道, 教育竞争场域逐渐从校内逐渐位移到校外, 由学校转向市场, 家庭开始在学校之外竞逐教育资源, 不同群体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权重在增加, 这进一步加剧了家庭教育投资的不平等。本文通过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 针对当前中国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的结构特征和群体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描述性统计的分析发现, 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存在结构上的差异, 并且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不同就学阶段的教育支出存在差异。子女教育总支出随教育阶段差异呈现先降后升的“V”形结构, 即学前教育和初中教育高于小学教育, 而校外“影子”教育支出从学前到小学再到初中则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递增趋势。第二, 不同群体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支出水平上存在差异。与较高收

入组、城市组家庭相比, 收入较低的家庭、农村户籍的家庭在子女总教育支出以及“影子”教育支出上不仅具有明显的相对劣势, 而且教育支出的增幅也相对较少。

本文基于多元回归模型的检验证明, 不同群体的家庭子女教育投资存在显著的差异。无论是家庭子女教育总支出还是“影子”教育支出水平, 收入较高的家庭显著高于收入较低的家庭, 城市家庭显著高于农村家庭。通过进一步比较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系数”, 本文发现不同群体家庭在教育投资意愿上也存在显著差异。即家庭收入增加, 中等以上收入家庭和城市家庭比中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家庭把经济增加收入更多地用于教育投资, 而且这种“增长的分化”进一步加剧了弱势群体家庭子女的教育累积劣势, 使得这些家庭在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竞赛中越来越“掉队”。

家庭教育投资在不同群体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以及“增长的分化”无疑会强化教育的社会再生产属性, 弱化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出身于家庭经济背景不利的孩子面对的不仅是输在“起跑线”, 而且似乎也不具备更快的追赶速度, 因为不同群体之间的教育“鸿沟”越来越加深。本文的研究发现试图从理论上为当前日益严重的教育的阶层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提供一种新的解释; 并试图在政策实践上能够提供一些新启示, 以期打破当前日趋严重的教育再生产, 促进教育公平。首先, 我们要削弱家庭作为教育资源分配的轴心地位, 降低市场化的介入。这并不是让家庭放弃教育, 让教育隔绝市场, 而是要改变由家庭和市场来主导教育资源的分配模式, 要进一步突出国家在教育保障中的主体性作用, 提高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供给量和普惠性。如实行学前义务教育, 加大“影子”教育管控力度, 改革考试升学制度, 打破“唯分数论”等。其次, 我们应进一步强化学校教育的主体性作用, 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 既要“减负”, 也要“增质”; 同时, 积极开展针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救助和帮扶计划, 完善家校合作的长效机制等。

参考文献:

- [1] 王庆环. 为何孩子教育费用越来越高[N]. 光明日报. 2012-03-15(10).
- [2] 刘保中. “鸿沟”与“鄙视链”: 家庭教育投入的阶层差异——基于北上广特大城市的实证分析[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8(2): 8-16.
- [3] BECKER G S.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70(5): 9-49.
- [4] LIU A, XIE Y. Influences of monetary and non-monetary family resources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in verbal ability

- in China [J].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 Mobility*, 2015(40): 59-70.
- [5] TILAK J B G.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expenditure on education in india: a preliminary analysis[J]. *Asian Economic Review*, 2002, 44(2): 326-332.
- [6] 楚红丽.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分析[J]. *教育科学*, 2008, 24(2): 9-15.
- [7] 丁小浩, 翁秋怡. 权力资本与家庭的教育支出模式[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5, 13(3): 130-142.
- [8] 涂瑞珍, 林荣日. 上海城乡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及教育负担状况的调查分析[J]. *教育发展研究*, 2009(21): 21-25.
- [9] 李煜. 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4): 97-109.
- [10] 钱晓焯, 迟巍, 史瑶. 义务教育阶段城镇家庭教育支出的构成及不平等: 来自 2007 和 2011 的实证证据[J]. *教育与经济*, 2015(6): 25-33.
- [11] 曾满超, 丁小浩, 沈华. 初中生课外补习城乡差异分析——基于甘肃、湖南和江苏 3 省的初中学生课外补习调查[J]. *教育与经济*, 2010(2): 7-11.
- [12] 谢宇, 胡婧炜, 张春泥.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理念与实践[J]. *社会*, 2014(2): 1-32.
- [13] 刘保中. 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投入状况的比较研究——基于 CFPS(2014)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17(12): 47-54.
- [14] 曼昆. *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M]. 梁小民, 梁砾,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05.

"Widening Gap": the Overall Status and Group Differences of Chinese Families' Educational Investment

LIU Baozho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Family is the "axis" of educational reproduction. Educational investment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families to compete for scarce educational resources for their children. Using the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in 2014",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overall status and group differences of Chinese families' educational investment.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total expenditure on children's education presents a V-shaped structure along with the differences of the educational stages. The expenditure on Pre-school, junior, and middle school educations are higher than that on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2) the "shadow" educational expenditure outside school presents gradual growth from pre-school to primary school and then to junior and middle schools. (3) Compared with low- and middle- income families and 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families, higher-income families and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families not only have obviou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children's total education expenditure and "shadow" education expenditure, but also have higher willingness to invest in children's education. 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in the period of market-oriented transformation, structural inequality and "growth differentiation" due to children's educational expenditures aggravate the cumulative disadvantage of vulnerable groups' education, resulting in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Key words: educational investment; educational expenditure; shadow education; group differences

(责任编辑 冯 蓉)